



在叶兆言家里最不缺的就是书,他也觉得太多了,但是每隔一段时间,他都会往书架上加上一本自己的新书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

读者的水平
决定了作品的好坏

读品:你说上个世纪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,但现在看,目前写书的人其实更多。网络写手看起来比以前的人更能写,一本书就是几百万字,对于这种“繁荣”,你怎么看?口水书里也能出经典吗?

叶兆言:我也做过网络写作的评委,后来想想,这几千块钱拿得真累。开个玩笑,不能说网络文学全是口水书,打个比方,所有的写作都是运动,我写的是乒乓球,他们写的是足球,你不能说哪项运动更好。文学的好坏不是由形式决定的。当然,还是那句话,所有的写作都是为读者服务的,读者的水平决定了作品的好坏。有些书写得很好,但读者不买账;也有些书压根没人看,但是有话题有噱头,别人还没看,就先开始打赏。时代变了,规则不一样了而已。

另外,经典的概念也不对,所谓的经典,就是对过去好作品的再次咀嚼,就是当时或者后来的流行,不流行就不可能成为经典,当然流行并不一定是水平最高的,这个时代可能成为经典的,也可能不是水平最高的书,而是点击率最高的那些。

读品:身为南京作家,你常常写南京,这部分投入的精力大吗?叶兆言:其实大概只占精力的1%,对于作家来说,所有的写作都必须有现实的基石,所在地或者故乡往往就是这个寄托感情的基石,对于莫言来说,高密东北乡就是他的基石,南京就是我的。

读品:对于现代人,你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建议?

叶兆言:最重要的,就是在什么年龄段看什么样的书,比如说,我少年时不读红楼梦,完全没兴趣,就不去强读。少年时,可以读些励志的文学,比如说雨果的书,比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这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塑造作用。如果错过了年龄,再回头读这些书就没有意义了,也读不进去了。

一起的人,他喜欢漫无目的地阅读,享受偶遇的惊喜。从开始阅读起,叶兆言就不是一个喜欢把书跟名利结合在一起的。



叶兆言

著名作家,南京市作协主席。著有中篇小说《艳歌》《夜泊秦淮》《枣树的故事》,长篇小说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花影》《花煞》《别人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太顽固》等。

叶兆言: 我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写作

叶兆言有多重身份:知名作家;书香门第叶家走出的第三代读书人;叶家第四代读书人、80后年轻学者叶子的父亲。他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,他还有另一个身份。

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,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,从上个世纪末的文艺黄金年代到手机成为生活主导的网络时代,作家叶兆言一直很幸运——他总是间接或者直接地踩在了每一个变化节点上。

于是,他见证了世界的不停变化,也见证了中国人对于读书这件事儿态度的转变。

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

1

叶家的客厅也是书房。这个通透的房间里,待客的功能被压缩在了最里面的一个角落,另外大片能沐浴阳光的面积,叶兆言给了阅读与写作。

叶兆言的家里,书籍随处可见。

你能在两个整面墙的书柜里发现古旧泛黄的线装书,能看到装帧朴实简单的世界名著,也能看到一两年内才出版的新作。这里有厚如砖块的大部头著作,也有不仔细看就会错过的口袋书。

这些绝不是叶家全部的藏书,他还有另外的书房,还有一些则被女儿叶子拿走了。这些文字与纸,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深厚底蕴。

叶家盛产读书人。祖父叶圣陶是中国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,有“优秀的语言艺术家”之称。父亲叶至诚也是知名作家,更以藏书广博著称。叶兆言继承了藏书与传统,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,如今,已著有文学作品几十部,煌煌数百万言。他的女儿叶子也是作家,如今在南京大学任教,专攻外国当代文学。

一脉相承的读书人把一本本书积攒了下来,如今,叶兆言却觉得“家里的书太多了”,多到已经影响他的生活。“每个书橱其实都有两层书。里面的是什么,根本不记得了。”

59岁的叶兆言说,他已经到了“毫不顾惜书”的年纪,朋友要是喜欢,尽可以从他这里拿走书。

2

说来让人不相信,对于叶兆言来说,最好的阅读时光是在文革的时候。“当时的娱乐实在是太匮乏

了,我靠读书来打发时间。”叶兆言说,文革开始前,他的家里就藏满了书。文革开始后,这些书一度被没收,后来过了一两年,它们又被还了回来,“为什么能还回来?年轻人结婚缺房子,有人发现了这些书,觉得不应该由着它们占据一间屋子。”

尽管少了些诸如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平原枪声》之类的战斗小说,但还回的藏书还是颇为丰富,少年叶兆言日夜都与它们在一起。“单纯只是为了兴趣在读书。”叶兆言说。读书当然是有好处的,尽管在当时看来,这个好处仅仅是“谈资”。

以读书为谈资的,主要有两个圈子。一个是地下的文学圈子,在这个圈子里,谁看过更多的“禁书”,谁就更受崇拜。另一个圈子,则是“乘凉的圈子”。“当时可没有电扇空调,一到晚上,大家都出来乘凉,坐在门板上侃大山,那个时候,谁读的书多,谁就能说更多的故事。”

真正的好处,是在上大学之后。当时,老师开出必看书目,叶兆言接过来一看,自己早都已经看过了。

如今的叶兆言,如同父亲与祖父一样都已经成了作家。但在当时,他想走文学这条路时,却是遭到反对的。“当时我父亲不希望我走这条路,在他看来,文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叶兆言说,他少年时,叶至诚因为写作被打成右派,但他并没有放弃写作,在那个时代里,他还在写,但是写的都是自己不愿意写的东西,所以他认为写作是一件苦差事,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羞辱。

说起这段往事,叶兆言不胜唏嘘,他觉得,从五四开始,中国人的读书观就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。

“我的祖父是五四亲历者,在他们看来,文化无法救国,他们觉得年轻人不该去学文学,而应该去学经济、学军事。”叶兆言说,到了他父亲这一代,文化更是成为苦难的开端,所以,他也不希望年轻人去读书。

出乎意料的是,这种观念发生改变,居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。

“主要是文化资源特别匮乏,人们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,当时,有年轻人去偷书,书被作为收藏品互相借阅,书店一旦有书,马上会排起长队。”叶兆言说,正是这种饥渴感造就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繁荣。

“大家都需要补课,所以文学青年和文学作品才大量涌现。不过现在看来,那时的文学水平并不高。”叶兆言说。

3

“读书这事儿,就跟股市一样,到了顶峰就得跌下来。”叶兆言说了一句特接时代地气的话。

叶兆言觉得,上个世纪80年代时,文学创作到了顶峰,任何一本书都可能印100万册,还都能卖掉,不过,当时的读者水平不高,也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写作水平不高。

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,社会上开始谈钱,却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辉煌的年代,叶兆言说,包括他在内,许多作家最好的作品都是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,一是因为当时读书人的欣赏水平上来了,二是因为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评奖,“评奖意味着设立标准,意味着模仿,所以,没有评奖反倒是好事。”叶兆言说。

叶兆言不是一个排斥技术进步的人,因为眼睛老化,如今的他已不再看纸质书,而是从电脑上获取资讯;他的电脑屏幕巨大,这是因为他写作也都是在上面以二字号完成。

但他却不认可当下的写作水平,“现在当然是有好书的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”叶兆言说,“不过我有时候觉得写不下去了,再看看现在当红的作品,马上会信心大增。”自幼家教严谨的叶兆言用这样一种含蓄的口气表达观点。

叶兆言写了大量关于南京的书,圈内圈外,他都被称为“最南京的作家”,但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地域作家,“我只是坐在南京这张凳子上写作。”